

语言·文学·写作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编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语 言 · 文 学 · 写 作

郭沫若、老舍、田汉、欧阳予倩、
赵树理、胡绳、朱德熙等讲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编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语言·文学·写作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110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6—4 成本费 0.90元

印数 1—10,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在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版前言

二十多年前，中央高级党校为了帮助学员学习党的文艺政策和写作知识，曾开设许多专题讲座，邀请国内的知名学者专家来校主讲。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为指导，结合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创作实践，对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语文写作的基础知识，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阐发。这些讲座的内容，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总结向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语言文学和写作教学的经验，它也是很宝贵的资料。为此，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的同志整理了郭沫若、老舍、田汉、赵树理、欧阳予倩、胡绳、朱德熙等七位同志的讲稿，编为专集，供党校系统的语文教师和学员在讲授和学习语文写作课时阅读参考。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繁重任务，要求在各个领域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具备多方面的广博知识。目前正在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和将要担任领导职务的后备干部，都有一个极为严肃、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及早努力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在社会科学方面，应当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固不待言，就以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来说，恐怕不少领导干部也是知之不深，语焉不详；至于缺乏写作知识，起草的报告、文章逻辑混乱，文句不顺，更是大有人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就很难思路开阔，应付裕如。结果，或者照搬“红头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全靠秘书，没有这根拐杖便不能迈步；更有甚者，一知半解，强不知以为知，那就不免要贻笑大方了。例如，就在最近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一位老部长竟把恩格斯为了阐明黑格尔哲学而引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说成是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果传为笑料。看来，不认认真

真、扎扎实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知识、业务知识，是很难胜任新时期的领导工作的。

领导干部的学习，既包括在职自学，也包括在党校进行系统学习。这就要求所有承担培训和轮训任务的党校都能尽可能地开设较多的课程，必修课之外，还要有选修课，以满足学员的不同学习需要。在这些课程中，语文写作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这本讲座汇编，就是很好的语文写作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七篇讲稿都是二十多年前讲的，自然带有当年的时代痕迹。由于其中多数学者已经作古，这次整理时对原文一般都保持原貌，未加改动。胡绳、朱德熙二同志在百忙中审校了原稿，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5年7月19日

目 录

屈 原与《离骚》.....	郭沫若 (1)
文学语言.....	老 舍 (18)
戏剧的艺术特点和话剧民族化.....	田 汉 (38)
关于戏曲改 革 问题.....	欧阳予倩 (69)
面向农村的 问 题.....	赵树理 (83)
漫谈写作.....	胡 绳 (100)
用词与造句	朱德熙 (122)

屈原与《离骚》

郭沫若

大家都知道，屈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流传到汉朝时，只剩下二十五篇了。这二十五篇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了。在这二十五篇中，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其中最可靠的，也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就是《离骚》。只要《离骚》这一篇保留下来了，也就能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其全面。

屈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影响很大。解放后，大家对屈原很重视，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搞过很多东西。不过屈原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了。他是战国末期的历史人物。战国时代，就是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所谓战国七雄就是：秦、楚、燕、齐、韩、赵、魏。

屈原生在当时的楚国，对他的生卒纪年有各种说法。我的看法（只是参考性的意见，不能作为定论），屈原大概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58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全部吞并了燕、韩、赵、魏、齐、楚，把中国统一了。

我们大家知道，文艺作品是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的反映。我们现在要研究屈原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两千年以前当时中国社会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所以通过作品也可以反过来了解当时所处的时代。大体上了解一下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政治趋势，这样再来读他的作品就比较容易一些了，也会理解得更深。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屈原的作品，那

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仅研究屈原的作品，研究任何古代作品都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一定要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了解产生这个作品的根源，这样对他的作品才能有比较可靠的认识。因此，在讲屈原的《离骚》以前，不能不讲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情况。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多讲，只能讲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那时中国的经济情况、经济基础是怎么样的呢？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铁器的使用出现了，从地下发现来说，虽然对春秋时代的铁器，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不过从地下出土的铜器上的文字看，可以肯定地讲，春秋时代已经使用铁器。春秋时代铁器的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这以前的原始工具，主要是木器、石器，生产力是有限的。铁器登上历史舞台，生产力就不同了。虽然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还没有发现春秋时代的铁器，不过在战国时期，南方、西方、最东方这一带普遍使用铁器了。这时的铁器主要是耕地的工具。在自然界中没有纯粹的铁，矿物要和别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炼成铁。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因为经过空气长时间的摩擦，里面有纯粹的铁，但数量很少。一般来讲都是采集铁矿石，再进行冶炼。因此，这就要有冶炼技术。这就是铁在中国出现很迟的一个原因。还有，把铁从铁矿中分离出来，那还只是毛铁、铸铁，不能炼钢，还要经过技术改进才能成钢。所以，初期的铁只能用作犁头、锄头之类，还不能拿来作为武器。中国出现铁的武器，是在战国末年才开始的，以前都是用铜，很多战国时期的武器都是铜的。秦始皇的大宰相李斯所使用的铜戈留下了，是青铜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把六国的武器收集起来，聚集在咸阳，把它熔化了，作成十二个铜人。他为什么把武器收起来熔化了呢？一方面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防止造反；另一方面因为铜器过时了，铁器登上了舞台。所以真正用铁作武器是秦以后，到汉朝才发展起来的。在战国时代，铁器主要是用作农具，

在农业上使用铁已经普遍了。用铁器耕田，是春秋时候出现的，到了战国时代，普遍使用在农业生产上。这就使得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一定要和生产关系密切配合，生产力提高之后，就使中国春秋战国以前——殷周的生产关系不能不发生变革，把殷周时代奴隶主占有制的生产关系逐渐改变了。在这以后地主阶级出现了，土地私有了，成为封建所有制的形态。铁这个东西，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完全、彻底地成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应该说是在唐朝之后。总之，由于铁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有了变化。

由于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不起变化。所以，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期的时代，是有很大变革的的时代。新思想也好，旧思想也好，在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那时诸子百家都出来了。“百家争鸣”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术语。诸子百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互相争鸣，互相诘难，相当热闹。百家争鸣是上层建筑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那时思想上、文学上的水平，差不多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峰。

当时的诸子百家都很会写文章，例如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很会写文章。拿诗来讲，那要算是屈原。当时的诗人不只屈原一个，但是屈原留下了不少作品。应该说同时代还有一些诗人和作品，可惜没有留传下来，或者说留传下来的很少。比如，我们研究一下荀子（荀卿，荀况），就有两篇应该注意：一篇叫《成相》，就是诗。这个诗的体裁很有趣，很值得注意。他作诗的排法是三三七四七，第一句三个字，第二句三个字，第三句七个字，第四句四个字，第五句七个字。他的诗相当长，一共有二百八十句，一千三百二十多个字。还有一篇叫《赋》，还有什么赋诗。所以荀子也是一个诗人，他就留下了这些东西。我们根据荀子这个例子来看，战国的诸子不光是作散文，也作诗，不过没有

保留下来。

特别要提起注意的是：因为生产起了变化，生产关系起了变化，所以人民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在殷周时代的所谓“庶人”，就是一般的农民。其地位在奴隶之下。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比如大孟鼎，记周朝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孟，并赏给孟一些供使唤的人，从驾车的人算起，一直算到庶人。庶人的地位在周朝初期是最低的，在奴隶之下。以后农业生产关系改变了，中国又是一个大农业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很多，所以庶人的地位就高了。到了战国，提高到皇帝以上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至少某些人的评价是摆在皇帝以上了。还有“民以食为天”，说明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没有饭吃的 话，还有什么国家，做什么国王呢？所以把生产者，把生产粮食的人摆在第一位。

有了这样的变化之后，反映在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在奴隶制时代，一切文化掌握在贵族手里，掌握在奴隶主手里，一般的人不能写信，连字也不认识。所谓民者，盲也。民是没有文化的。可是，后来民的地位提高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在战国的时候，文化上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从文学上的变革可以看出来。我们研究殷朝的卜辞，研究殷朝初年的文字，那些都是脱离人民生活的东西，都在贵族的掌握下。可是到了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我们要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看诸子百家是老古董，但在当时是新鲜事物。特别是“也、哉、乎、焉”这些字，在殷周贵族的文字里没有这些东西，但在战国时期出现了这些字，这是人民的口语。所以，春秋时代的文字与人民的语言接近了。

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社会上起了变化。文化上发生了变化。最有趣的是“百姓”，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庶民。在过去，百姓是指贵族，有姓的都是贵族。在殷周时代，称为百姓都是很高贵的，而庶人是不能被称作“百姓”的。但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现在大家都称为百姓，又都称为庶民了。

对屈原的思想和作品要作比较确切的认识，应该从当时的环境去了解。

再一点，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一个变革，就是在春秋末年，战国时候，普遍要求把中国统一起来，那个时候叫作大一统。孔子也有大一统的思想，要把中国统一起来。这个东西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中国真正历史的开端（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不是一家，还没有成为家），是从殷朝开始，在殷以前，地下的发现没有确切的证明。有的人把地下的东西联系起来，那是我们的联系，究竟怎么样，现在不敢说。但是可以肯定，殷甲是有相当高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在殷朝的时候有一定的发展，周朝比殷朝落后一些。殷朝末年在黄河流域发展，后半期与长江附近的民族——夷人发生长期的斗争。夷人有一个时期很厉害，占领了黄河流域，甚至发展到山东，可见在古代夷人是向北发展了。我们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确认殷朝末年有两个殷王，一个是帝乙，一个是帝辛。帝辛就是殷纣王，他挨了三千年的骂。但殷王帝辛把夷人克服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正当殷纣王和长江流域的民族作斗争的时候，周朝从后面来打他的后背，结果殷纣王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在和夷人斗争中消耗太大，再一个是他把被征服的夷人吸收为兵。在古诗上说：“亿兆夷人离心离德”。这些夷人是俘虏来的，殷纣王把这些夷人拿来对敌，结果夷人叛变了。殷纣王垮台了，周朝代替了他。周朝代替殷朝之后，就继承殷朝的文化，在黄河流域一带发展，与殷朝的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孔子也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从文字上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当殷朝被打败之后，殷朝的后人跑到南方去了，这样把殷朝的文化也带到了南方。于是在政治上形成了几百年的对立（在春秋以前，西周的几百年，事实上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是对立的）。这并不是周朝把什么人分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骗人的话，事实上几百年间，周朝人都把长江流域的楚国人当作殷人。到了孟子的时候，骂楚人是南蛮子。所以，南方

北方在政治上的对立是很尖锐的，经常不断地有斗争，可是文化的发展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的文化，殷人把它发展起来了，以后周人继承下来继续发展；到长江流域的人，又带着殷人的文化向南方走。所以几百年间南北尽管有斗争，但是，是在同一个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到了春秋的时候，经过了几百年，南北两方的文化有分开的情况，但是来源是一个，所以发展的结果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到了车同轨、书同文。我们研究古代文物时，不管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出土的铜器，文字记载都是一样的，甚至于文风也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大体上的情况。

历史经过这样几百年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要求，就是要整个中国统一起来。这个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表现为由万国发展到十二个诸侯，再发展到战国七雄，再发展到秦统一。语言相同，文字相同，由同一个殷周发展下来的，为什么北方要把南方当作“蛮子”呢？问题就是争夺由谁来统一。在战国七雄时实行兼并，过去的观点认为应该反对以那样的战争来吞并小国；但是今天看来，这是中国统一必经的步骤。把小国合并起来，才能走上大一统。今天不能用旧时代的观点来看战国，旧的观点把春秋时代看作黑暗的时代，那是错误的。谁来统一中国呢？应该说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都想统一，而且对中国的统一都下了功夫。可是乒乓球锦标究竟能落在谁的手里，要经过比赛。发展的结果，大体上是秦和楚在进行争夺，看谁来统一中国。楚国的派头很大，因为它到南方去了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差不多都统一起来了。甚至有一部分进入了黄河流域，山东、山西都有楚国的地方，还发展到云南。楚国的版图最大，地方最好。因为长江、淮河流域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很有资格争夺一下。秦国是后起来的，它的地理形势很好，是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地占了西北高原。自从秦孝公用商鞅以来，秦的帝王都是有作为的人，因此秦就逐渐

发展起来。都想统一中国，怎样才能统一呢？就是看你能不能争取人民，谁能够得到人民，得到人心，谁就能够得到天下。孟子也说：“得天下有道”。统一天下要有办法，把老百姓的心掌握了就有天下。所以，在战国时期，诸子都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经成为一个定论。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怎样才能使老百姓拥戴呢？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粮食要充分，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保卫全国的安全，然后人民才能相信你。所以要得民心，要对得住老百姓，这个思想发展下来，就成为以后的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可以归纳为几句话：重耕战、尚武功，信赏必罚。就是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才能使人民相信。李悝、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秦孝公至死都信任商鞅。商鞅到秦国后，秦孝公很重用他，一直进行改革，把旧的办法完全废掉了，把老百姓掌握住了，因此秦国一天天富强起来。秦尽管是后起的国家，但它一天天发展起来，对关中六国（韩、赵、魏、燕、齐、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了战国末年，成为秦、楚对垒的形势。楚国国大，资本不少，土地多，它是有资格的，但是秦国的方法对，生活在苦的地方，对它有好处。人生活在优越的地方不好，生活在苦的地方才懂得艰苦。生活在苦寒地方的秦国，本来是不利因素，但反而利用它成为有利的因素，促使自己进行战斗。生活在好地方的楚国，这本来是有利因素，但反而成为不利因素。秦楚形成对垒，而齐国成为第三类情况，韩、赵、魏逐渐衰退下来。燕国在当时处于偏僻地区，在河北、辽东半岛。

秦楚称霸，搞合纵、连横。南北为纵，合纵就是关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东西为横，连横就是不管关东关西都拥护秦。所以，战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的思想倾向是：或者把关东六国联合起来和秦对抗，或者都拥护秦，把中国统一起来。秦楚斗争的结果，秦起来了，楚国倒下去了。原因就是秦从商鞅以来方法对，奖励耕战，尚武功，这样逐渐强起来；楚国走了相反的路，

它对老百姓不重视，而且军队也不好，所以失败了。那时秦国有一个大将叫白起，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将军。他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带兵把楚国打败了，一直打到长江、洞庭湖，几乎把楚国灭亡。楚王逃到本国东北去，暂时住下来。白起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楚国为什么被打败呢？在《战国策·中山》中有一段话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楚国在同秦国的斗争中，在最重要的关头遇到的两个国王都很糟，一个是楚怀王，一个是楚襄王，这父子两个都是草包。这两个人把楚国的大好形势搞坏了。他们是败家子。正如白起批评他们的：依靠着自己国家大，不搞好政治，内部不统一，把好人排斥了，老百姓不齐心，军事上又不准备，这怎么能和秦对抗呢？特别是在政治上，策略上有错误。本来搞合纵对楚国有利，特别是楚国和齐国的关系很好，如果在策略上坚持合纵，和齐国共同抗秦，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它不用这个办法，受了秦国的骗。秦国用一些花言巧语进行欺骗，它就不合纵了，就和齐国绝交，和秦好。以后秦国变了，楚怀王被关了三年，最后死在秦国。

当时的局面就是这样一个形势。这是楚国所处的时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可以进一步了解屈原和他的作品。

屈原本来是楚国的贵族。屈、景、昭是楚国的三大姓。屈原作过三闾大夫。他自己说他是贫贱的。吴起在楚国作宰相，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的时候，曾规定了制裁贵族的法律，就是贵族的父、子、孙三代可以有土地，三代之后就土地没收了。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材料：一个是《韩非子·喻老篇》说：“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在《韩非子·和氏篇》，吴起对楚王说：“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这是楚国的法律。吴起执政时间很短，只有一年（秦国商鞅执政20年），就被贵族杀死了。屈原是一个贵族，由于楚国法律的规定，使得他能够同人民接近，了解人民的

思想感情，所以他的诗里有很多地方说明人民生活的艰苦。屈原本来想到外国去，但是他看到老百姓受苦，就舍不得走，留下了。屈原尽管是贵族出身。但是从他的作品来看，能够和人民接近，能够了解人民，同情人民。当时的所谓民，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就是庶民。

从屈原的整个作品来看，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根源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要求大一统，把中国统一起来。他所称赞的一些古人，都是合乎儒家思想的。他所反对的，也是儒家思想反对的人。他认为应该着重道德，一个人要有修养，要讲仁义。这些都是与儒家思想分不开的。关于孔子的评价，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在封建制的上升阶段，应该肯定是进步的，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好作用。不管对古代分期怎么样看（有人认为分期从西周开始，我的说法是从战国开始，相差几百年），尽管有几百年的相差，但是在战国的时候，说封建的上层建筑、封建的上层阶级的思想已经开始反动，这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大符合。所以，今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历史上升阶段的思想，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民族精华，这个东西不要否定掉。屈原基本上是儒家学派，同时也有法家色彩。法家来源于儒家，吴起就是一个例子，商鞅还要晚一些。屈原有法家的色彩，从他的作品里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他在《九章·惜往日》中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秘密之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就是说，受到国王的信任，把前代的东西继承下来，发展下去。凡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都要搞清楚，凡是肯定的地方都要肯定下来。这样国家就富强了，国家的法也建立起来了。把工作交给可信任的人做，这样天下就可以很好。

从他的作品来看，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对是非赏罚要严明，对法律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就是国王也不能违背法律。这和《史记》讲的情况差不多。因为楚怀王曾经信任他，让他作左徒

官。这个官究竟是什么品级的官呢？不能肯定，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的后一辈曾经从左徒升为令尹，令尹就是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看来左徒这个官职是不小的。司马迁说屈原“博闻强志”，他的记忆力很好，记事很多。还说他“明于治乱”，是非分得清楚；“娴于辞令”，很会外交。从这里来看，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

在《惜往日》中讲的“先功”两个字我们要注意：这里包含着吴起的办法在里面，继承前人的成绩，加以发扬光大。说到“先功”，不能把吴起丢掉。因此，屈原这个人有法家色彩。他是不是重耕战呢？这一点也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卜居》这篇文章，当然不一定是他作的，也可能是屈原的后人作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是研究屈原的可靠材料。比《淮南子》还要早。屈原提了八件事，也可以说是八对事。屈原说：“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谏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昵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媮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騊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这里屈原说，我是拿起锄头耕地好呢，还是到国外去作一个游客好呢。他在这里提出八对问题，每对问题上问的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已经做的，下面一问是相反的，是不愿意的，反对的东西。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他自己没有拿锄头耕地，至少他重视这个事情。他虽然说，我是拿锄头耕地好呢？还是到国外作游客好呢？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作游客，而愿意耕地。从这个材料也可以证明他是重耕战。

当然，有的时候是材料多多益善，但两千年前的东西，很难找到更多的材料。有时要看材料的性质，如果是很重要的材料，那怕是一点点也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如果是不重要的材料，搞